岁月长河中的诗意栖居

——评叶葆菁先生《往日时光》

□余徐刚

当88岁高龄的叶葆菁先生拄着拐杖将自编自绘的散文集《往日时光》送到铜陵三中时，我被感动了。这个场景本身即构成极具象征意味的文化意象——知识的传递、记忆的存续、匠人精神的传承在此刻交汇。

《往日时光》不只是一部个人回忆录，更是一部城市文化基因的密码本，记录着共和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个体生命史，是对一个时代的深情致敬，它如同一座桥梁，连接着过去与现在，让读者得以穿梭于历史的长河之中，感受那些被时间雕琢的光辉岁月，折射出知识分子在专业理性与人文情怀之间的精神求索。

一、双重维度的生命书写

（一）结构美学与文学叙事的互文

作为西安建筑工程学院（现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培养的早期专业人才，叶葆菁先生的建筑师生涯塑造了其独特的观察视角。在《架子工》《建筑者的舞台》等诗作中，我们能看到专业视角对文学书写的深层渗透：对空间秩序的敏感转化为文本的结构意识，对力学平衡的考量演化为叙事的节奏把控。如同他设计的铜陵有色动力厂车间将功能性与审美性完美统一，其散文创作同样呈现出严谨的架构与诗意的表达相融合的特质。例如《铜官山不会忘记》以矿脉般的层理结构展开叙事，地下巷道般的纵深叙述与地面建筑的线性铺陈形成空间对话。

（二）技术理性中的人文温度

在工业建筑领域追求标准化、功能化的同时，叶葆菁先生始终保持着对“人”的观照。在“英雄人物”篇章中，叶葆菁先生以温暖而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一系列平凡而又伟大的形象。这种矛盾统一在其《不敢说热》《二婶，我真想给您磕个头》等作品中尤为凸显。无论是英勇无畏的矿工，还是默默无闻的普通劳动者，甚至是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展现出人性光辉的小人物，如卖雪糕的老人、幼儿园里的老师，都在叶葆菁先生的笔下获得了光照。他通过这些生动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人性中最宝贵的品质——坚韧不拔、无私奉献与乐观向上，这些故事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明白，英雄不仅仅存在于历史书上，他们就在我们身边，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当多数工业题材文学沉迷于宏大叙事时，叶葆菁先生将镜头对准卖雪糕的老人、矿工妻子、二婶，用工程师的精确记录普通劳动者的生命轨迹。他的视角转换源自建筑实践中的根本认知：任何宏伟建筑的基石都是具体的个体生命。正如他在《公墓碑前忆故人》中的叩问，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建设者，恰是支撑城市崛起的真正柱石。

二、记忆重构的三重叙事空间

（一）英雄叙事与平民史诗的交响

著名评论家崔国发先生指出的三类创作主题，实质构成了城市记忆的立体图谱。《身后，有一座塔》中的英雄叙事不是简单的讴歌，而是通过建筑意象实现精神对话——烈士纪念塔的物理高度与精神海拔形成复调结构。与之形成对照的《门前宴》等市井叙事，则如建筑效果图中的比例人像，赋予宏大历史以生活质感。这种叙事策略打破传统报告文学的范式，让矿工吴师傅的皱纹与铜陵有色办公大楼的轮廓线在文本中平等对话。

（二）地理空间的情感编码

作为铜陵长江路沿街公园的建设参与者，叶葆菁先生在《一路风景》中展现的空间书写具有特殊意义：对自然之美与人文景观的深情描绘。从京城的繁华到舟山的宁静，从浙江古镇的古朴到江南水乡的温婉，叶葆菁先生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用诗人的眼光捕捉每一个瞬间的美丽，用散文家的笔触记录下时代的变迁与人的需求。这一部分不仅展现了叶葆菁先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敏锐的观察力，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他对生活的热爱与向往，对美好事物的不懈追求。

叶葆菁先生对城市景观的文学重构，本质是工程师与诗人的双重身份对话：测算数据的技术理性与审美体验的情感逻辑在此碰撞。汛期大通古镇的描写既包含水利工程师的专业观察，又流露文人面对时间侵蚀的惆怅，跨学科视角使地理空间转化为承载集体记忆的文化容器。

（三）时间廊道中的情感考古

“真情难舍”篇章，则是整部作品中情感最为深沉的部分。在这里，叶葆菁先生以真挚的情感，回忆了与亲人、朋友、师长之间的点点滴滴。无论是对母亲的怀念，还是对二婶的愧疚，亦或是对老师的感激，每一篇文章都饱含深情，让人动容。特别是叶葆菁先生对于自己一生的反思，那种对过去的不舍，对未来的淡然，以及对生命中每一次相遇的珍惜，都让人深受触动。这部分内容不仅是叶葆菁先生个人情感的真实流露，也是对所有读者的一次心灵洗礼，提醒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不要忘记那些最宝贵的东西——亲情、友情和师生情。

《母亲的回忆》《又见皋城 又见老淠河》等怀旧篇章，构建独特的时间建筑学。不同于线性叙事，叶葆菁先生采用类似建筑修复中的“层积法”：将不同年代的情感记忆并置叠合。对老淠河的追忆既是个体乡愁的抒发，更暗含对城市化进程中水系变迁的生态思考。这种将私人记忆嵌入公共历史的写法，使散文成为保存城市文化DNA的特殊载体。

三、文体实验与美学追求

（一）非虚构写作的范式突破

在2500字的《铜官山不会忘记》创作过程中，叶葆菁先生耗时月余走访二十位老建设者的田野调查式写作，开创了散文创作的新范式。他将工程勘察方法引入文学采风的做法，使作品兼具口述史料的真实性与文学想象的感染力。当建筑图纸上的数据标注转换为文字中的细节描写，专业严谨性升华为美学真实性。

（二）质朴文风中的修辞营造

铜陵本土作家、评论家朱永宽评论叶葆菁先生作品时强调的“真”，在语言学层面体现为去修饰化的表达策略。但细察《曾经》等篇章，“平平坦坦的铺垫”“大大小小的漩涡”等建筑术语的自然转化，暴露出作者隐秘的诗学追求。叶葆菁先生专业语汇的文学转译，恰似混凝土中的钢筋网络，在质朴文字下构筑起精妙的结构张力。看似“不善言辞”的工程师，实则以材料力学的思维锤炼语言。

（三）跨界艺术的形式融合

《往日时光》的独特之处在于文本与速写的互文关系。自绘插图不是简单的装饰，而是作为平行文本参与叙事。某页角落的脚手架速写，可能与正文中建筑工人的故事形成视觉呼应；斑驳的老街素描，则为怀旧文字提供空间注解。多媒介叙事，正是建筑师生涯培养的整体思维在文学领域的延伸。

四、文化坐标中的精神守望

（一）工业文明的诗意解构

在《下井的日子》等作品中，叶葆菁先生以参与者的内部视角解构工业神话。对矿工日常的平视书写，消解了传统工业文学中的浪漫主义滤镜。当多数作家仰望高炉的钢铁巨影时，他却记录下硫烟在皱纹里刻蚀的轨迹。这种书写不是对工业文明的否定，而是以知识分子的理性，在机器轰鸣中寻找人性的恒定温度。

（二）城市文脉的修复工程

作为铜陵作协原副主席，叶葆菁的文化自觉体现为对地方文脉的系统梳理。其创作可视为另一种形式的“旧城改造”：用文字修复被时间侵蚀的城市记忆。《铜陵文化长诗中的一行》等作品，实质是以文学手段进行的文化遗产保护：努力与主持大通码头栈桥设计的工程实践形成奇妙呼应——前者修复物质桥梁，后者架设文化通衢。

（三）知识分子的伦理自觉

《一生负债》中流露的愧疚意识，折射出共和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将个人成就归因于“社会给予”：集体主义价值观贯穿其创作始终。他曾在报告文学《哺饲》中，将教师黄艳的形象正是这种伦理观的具象化：知识的传递如同建筑工程的接力，个体只是文明长链中的临时焊点。

《往日时光》这部书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的变迁，感受到了人性的光辉，体会到了情感的力量。叶葆菁先生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思考，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美好记忆，也让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对自己的生命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感悟。这位老建筑师的文学实践启示我们：真正的传世之作，既要像铜陵长江大桥般扎根现实土壤，又要如江南烟雨中的古镇飞檐，在时光中勾勒出文明的天际线。

飞流不断带书声

——寻找铜陵太白书堂的遗址

□仇永基

铜陵五松山太白书堂，自古以来便是文人雅士心中的圣地，承载着无数墨客对诗仙李白的敬仰与追思。历经千年风雨沧桑，这座书堂是否依旧屹立？若存，它又位于何方？通过大量史料的翻阅与千年历史变革的追溯，我终得以理清太白书堂的盛衰历程，并探寻到其遗址的所在。

史志上有明确记载

据《大清一统志》载：“李白书堂，在五松山。李白来游，乐其山水之胜，建堂读书于地。”明朝嘉靖四十二年，也就是1563年编修的《嘉靖铜陵县志》也有这样的记载：“五松山，在县南四里，山旧有松，一本五枝，苍鳞老干，黛色参天，故名。唐‘至德’年间，李白筑室于上，为五松书院，有题咏。”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的夏季，李白只身一人第二次来到铜陵，这次来，他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在五松山住了下来。所谓“筑室”，说白了就是盖房子居住。756年唐肃宗（李亨）继位，改年号为“至德”，时间上基本吻合，也印证了县志记载内容的可信度。也就是从755年到756、757年期间，李白在铜陵五松山盖了房子。

那么李白在五松山盖了房子（此房子即被后世称为“太白书堂”的前身）干什么呢？明正统元年（1436年）任铜陵县教谕的王贯在《铜陵四咏》诗中用美妙的诗句这样描述：“谪仙曾此究遗经，遂使松山擅美名。乔木尝青含秀气，飞流不断带书声。”

王贯的诗句非常形象生动地告诉我们，李白曾在五松山书堂读书学习，研究儒家经典，不仅使五松山的美名远扬，而且使一大批年轻学子增添了书生秀气，连长长的瀑布流水都不断传来琅琅的读书声。李白这种大兴读书之风的实际行动，不仅为铜陵读书人做出了榜样，而且影响了后来历代的文人学士，并且使“五松山太白书堂”声名远扬，成为名人雅士追寻之地。

历代名人名流赋诗凭吊

“铜陵为池名邑，襟江带淮，山水奇丽，畴昔名贤，穷幽览胜，冠盖相望。自唐翰林李太白读书于五松山，文采灿然，闻其风者，莫不兴起，涵泓演迤。”（清《乾隆铜陵县志》卷之十四·“艺文上”载元教谕徐观《尊贤堂记》所记）

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宋代大诗人苏轼、黄庭坚追寻诗仙足迹，游历五松山，还在“太白书堂”边建亭，游憩酬唱，是为“苏黄吟诗亭”。苏轼《题陈公园》诗云：“要是谪仙回舞袖，千年翠拂五松山。”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宋代名宦李纲（尚书右丞、抗金名将）路过铜陵，登五松山，写有《游五松山观李太白祠堂》诗曰：“薄游五松山，获见谪仙像。谪仙当此时，逸气隘天壤。脱身来江东，缥缈青霞赏。作诗几千篇，醉笔笼万象。”

李纲还发出“迄今有遗祠，识者共瞻仰”的感慨，也明确告诉我们：铜陵李白祠堂建在五松山，最迟不会迟于北宋。宋代皇祐年间中进士第一的郑獬作《五松山》诗，题注写道“李白尝游此，今有宝云寺。”诗中云：“天上仙人谪世间，醉中偏爱五松山。”南宋进士戴昺嘉熙四年（1240年）作《五松山太白祠堂》自注“太白读书之地诗有要回长袖舞拂尽五松山即此山也。”诗云：“犊舟来访宝云寺，快上山头寻五松。捉月仙人呼不醒，一间老屋战西风。”

南宋淳熙七年（1180年）曾任铜陵县令的林桷作《题太白五松书堂》诗云：“翰林最爱五松山，长说千年未拟还。”南宋进士阜民也作《题太白五松书堂》诗云：“千年舞袖云崖冷，几度桃花春水深。犹有门前旧题句，松风万壑老龙吟。”

此外，元、明、清历代墨客名流也纷纷慕名而来，拜谒太白书堂，赋诗抒怀。据统计，在明嘉靖《铜陵县志》《铜都历代诗词集注》、清乾隆《铜陵县志》《南陵县志》等史书中，共收录了40多首关于五松山的名人诗词。这些诗词中，文人们对太白书堂的称谓虽有所不同，但自南宋起，大多数文人墨客还是称其为“五松山太白书堂”，认为这一称谓更为符合历史实际。

太白书堂的历史沿革

在漫长的千年历史长河中，受环境、条件、气候、战乱等因素的制约，“五松山太白书堂”屡建屡毁，命运多舛。

据乾隆《铜陵县志》记载：“唐天宝年间，李白因留恋五松山风景之胜，在此建‘太白书堂’，后圮。”虽然唐代所建的“太白书堂”不复存在了，但未能阻止历代文人墨客崇拜李白、景仰李白的脚步。北宋在太白书堂遗址处将低矮的“五松书屋”改建，易名为“李太白祠堂”，绘太白像于中祀之（李纲诗中有描写）。到南宋因抗金，兵乱失修，“一间老屋战西风”，旧屋断毁。元朝至元年间，铜陵邑尹（知县）方浚于遗址处重修太白祠，绘太白像，元末又遭遇战乱损毁。明弘治三年（1490年），铜陵县乡贤袁思琼捐资再建，改称“李白祠”。到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董应扬任铜陵教谕，游历五松山，见太白祠凌乱不堪，在他写的《五松胜游》诗中有感而发“胜地有灵垂不朽，遗祠何事邈难留。”梳理这些史志上记载，让我们搞清楚了历代这些建筑始终没有离开五松山李白筑室读书的遗址，只是在原址上建了毁，毁了再建。

那么到了清代，对于明代所建已经破旧不堪的“太白书堂”是否有所重建重修？为此我们翻阅了好几本清代县志，终于在《乾隆铜陵县志》上找到了这样的记录：“居岁余，铜之两生章廷钎，廷锷至，恂恂纯谨，文章卓然可观……久之，乃合呈其尊人云逵，承先世之志，独力捐建五松书院，积屋之数若干……噫！何其慷慨而好义也。”（清《乾隆铜陵县志》卷之十四“艺文上”载翰林喻炜《五松书院记》所记）

清代明经（明清对贡生的敬称）汤韶美游历铜陵时作了一首《太白祠怀古》，也佐证了章氏兄弟兴建铜陵五松书院的义举。诗中写道：“千古人豪作酒仙，徜徉逆旅鹏高骞。敬亭云去鸟飞尽，松风醉吾呼青莲。”诗中的注释说道，“敬亭”即铜陵章氏兄弟修建太白祠后给取的另一名称。乾隆五年（1740年），章氏兄弟的捐建终于落成，并定名为“五松书院”。

遗址的探寻与发现

关于清乾隆五年后的五松山太白书堂修建情况，史料中鲜有记载。为了探寻其遗址的所在，我于2023年4月采访了曾负责铜陵市天井湖公园创建工程的老主任黄毅。

黄毅主任时年84岁，但身体健康、思路清晰。他向我详细讲述了天井湖公园创建初期的情况。上世纪70年代，为了修建天井湖公园，黄毅主任找到了五松村村部。在村部，他看到了一张新中国成立前（1947年）的《安徽省地图》。地图上清楚地标明五松村村部所在地（即现在天井湖公园儿童乐园东面的“爱乐轩”历史建筑）就是五松山的中心位置。

当时因公园建设需要，五松村村部需要迁移。村主任对此依依不舍，因为村部是解放后利用原清朝太白祠改造的，风景优美、环境宜人。经过动员后，村部最终得以搬迁。随后，天井湖公园建设指挥部决定在原五松村村部（即清代太白祠遗址）的基础上进行改扩建，打造一个以纪念李白为目的的园中园。

为了确保工程的准确性，指挥部还请来了建筑专家对原五松村村部建筑进行察看。专家认为，这栋建筑是典型的清代歇山式书院建筑，具有透雕木刻门窗和结合沥粉、扫青绿等手法的壁画装饰，充分体现了清代建筑的特点和风格。结合时间、地点等因素，可以认定这栋建筑就是乾隆五年章氏兄弟所捐建的五松书院。

为了增强园中园的文化氛围，指挥部还特地邀请了国内几位雕塑专家审核，并在园中竖立了白色大理石的李白塑像。这尊塑像至今仍完好地矗立在园中，见证了李白与五松山的深厚渊源。此外，园中还保留了“苏黄吟诗亭”以及民间传说的“李白晒靴石”“李白背倚石”等景观，共同构成了对李白及其五松山书堂的美好追忆。

经过千年的风雨沧桑，五松山太白书堂虽屡建屡毁，但其文化精神却历久弥新。在铜陵市天井湖公园的“爱乐轩”中，我们得以窥见这座历史书堂的遗韵。它不仅是李白留给铜陵人民的宝贵文化遗产，更是激励后人不断追求文化进步的精神灯塔。让我们共同珍惜这份历史遗产，让它在新时代继续发光发热。

寻 幽 周文静 摄

铜官山

态度的变脸

□吕达余

滴水崖

作为世俗中的人，面对纷纭的世事，都会有自己的态度，或褒或贬，或喜或憎，或亲或疏。然而，世事是发展变化的，人的态度也会变化，这是正常的。但一个人对同一人与事的看法与评价，在短时间内应是统一的，不会发生截然两样的变化。可是，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偏多有朝秦暮楚、今是昨非的人和事，此可谓态度的变脸。

且谈个古人的例子吧。这是一则唐人笔记，来自李肇的《唐国史补》。说有一个叫裴佶的人，其姑父在朝中做官，声望一直比较好。有一次裴佶去看他姑母，正逢姑父退朝回府，见姑父深深叹息一声：“崔昭算个什么东西，大家都称赞他，这一定是他到处行贿之故。这样下去，天下怎能不乱？”说曹操曹操到，话音刚落，门人报寿州使君崔昭拜见。只见姑父怒斥门人，还嚷嚷着要鞭打他，过了很久时间，才勉强出来接见。见面不一会儿，急命上茶，备酒席。姑母甚觉奇怪，说：“前何倨而后何恭也！”姑父回到内室，面带许多喜色，从怀里掏出一纸，原来崔昭赠官绸一千匹。此官对人的态度岂在朝夕，片刻就有了根本的变化，令其太太也大感意外和不解。何也？无他，立场决定态度。立场何谓也？人们会说是信仰和价值观，但对多数普通人而言，立场其实就是利益，利益决定态度。裴佶姑父之前后态度，看似表现两样，其实内里则一，只在有利无利。

人的态度是很表面的东西，核心的东西是内心持有的价值观，有人以公平正义等精神的东西为价值，有人以个人或团伙的地位和物质利益等实用的东西为价值。由此为分野，而体现人格之高下。有的人一生的价值观从无变化，就是利己主义的价值观，一切以自己的切身利益为价值取向，这样的人一生对事对人的态度，可以说是一以贯之、从无变化的，或者说是万变不离其宗。在世俗的社会里，利己主义是常人的信条，我们不必厚责于人。但作为公务人员、知识分子、公益行业从业人员、负有特殊使命的人，是不能以常人自视的。今天，我们的公务人员更不等同于封建官吏，秉持宗旨、公而忘私应是公务人员的职业操守。如今各类被查处的腐败官员，常常违背的正是这一点，他们在会议桌上是一副面孔，在酒桌上又是另一副面孔。

为官理政不能有私人立场，处理公事不可有个人态度，个人利益必须置之脑后，公众权益时时放在心中，多行仁政于公堂，莫索财贿于暗室，只要立场从内公正，则态度自外泰然，自不会成为如裴佶姑父那样的“两面人”，而遗恶声于历史。立场公，则态度正；价值偏，则行为堕。由态度与行为在不同场合的外在变化，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肚肠的。审察一位官员德绩如何，思想立场怎样，如其态度多变、不能如一，此一时彼一时，就可大概知其端倪。

我们批评一个人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这是什么态度？！”领导要求属下纠正错误时，也说：“你要改变你的态度。”我们在官员管理中，对于犯错误的官员，不能因一时态度好了，就以为问题解决了。其实，这还是没有追究到根子上，态度是可以伪装的，可以人前人后不同的，态度背后的思想根源才需要时常问一问，究一究的，这也是我们党时常强调要加强党员干部学习教育的原因，而且这种学习教育一直是持续进行的。一个官员，只有心正了，他的态度就不会多变，对正确的事是一张春天般的笑脸，对错误的事则是包公的漆黑的黑脸，然而内里的颜色原是一样的，统一的，不曾变的。

本报地址：铜陵市义安大道北段327号 邮政编码：244000 电话：总编室：5860136 编辑部：5860131（传真） 办公室：5861227
广告部：5861508 （联系人：陈幸欣） 订阅：全国各地邮局（所） 全年定价：100.00元 印刷：铜陵市闻达报业有限责任公司（铜陵市淮河大道北段358号）